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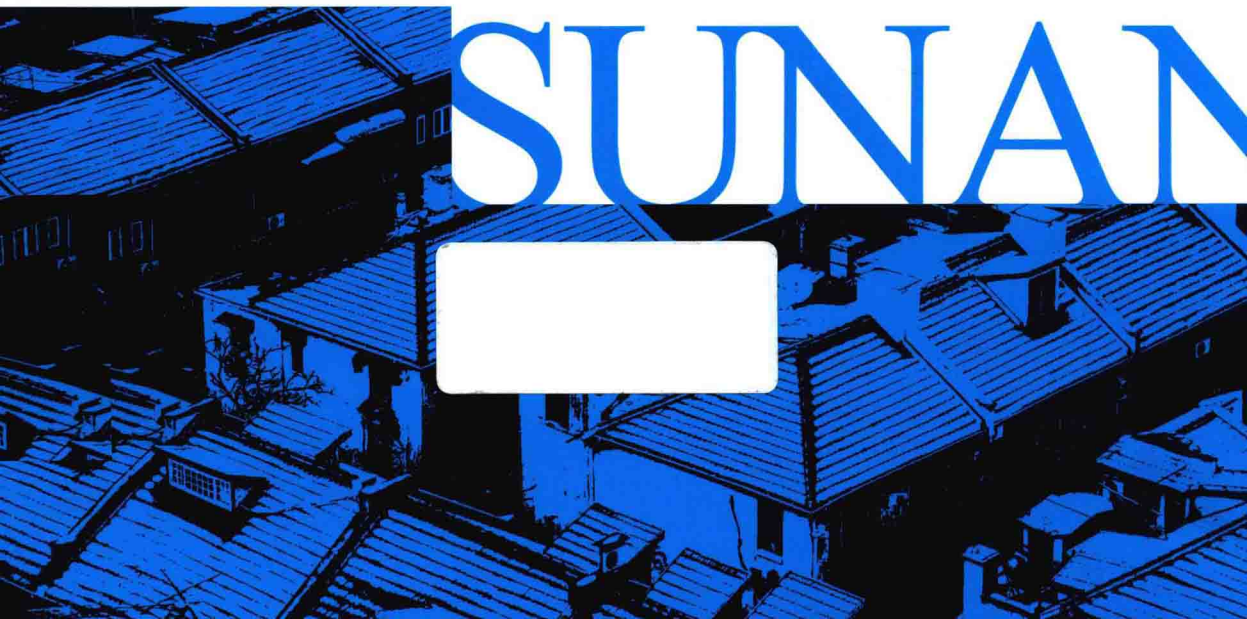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苏南发展研究丛书

陈 忠/主编

城镇化与城乡融合

张腊娥 朱 淀 等/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SUNAN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苏南发展研究丛书

陈 忠/主编

城镇化与城乡融合

张腊娥 朱 淀 等/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张腊娥,朱淀等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7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苏南发展研究丛书/陈忠主编)

ISBN 978-7-207-09091-1

I. ①城... II. ①张... ②朱... III. ①城市化—研究—中国 IV. ①F29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5298号

责任编辑:李 珊 李智新

封面设计:语墨弘源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苏南发展研究丛书

城镇化与城乡融合

张腊娥 朱淀等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哈尔滨圣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9091-1

定 价 36.00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什么是好的城市,如何建设好的城市?

——关于中国城市发展与城市研究的基础视阈

(代总序)

陈 忠

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近 50% 并将继续提升。人们在不断感受城市发展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日益遭遇诸多始料未及的城市问题。什么是好的城市,如何建设一个好的城市,成为人们聚焦和关注的重要问题。正如著名城市学家芒福德、科特金等学者所指出的,城市是人类的最伟大作品,“人类最伟大的作品始终是她所缔造的城市”^①,没有对城市本性的深层把握,没有合理的城市观,城市的发展前景将令人堪忧。树立合理的城市观与城市研究视阈,对规范城市发展行为,建构更加合理的城市与城市社会,具有基础意义。

一、复杂“城市性”与城市研究的综合视阈

关于城市本性(城市性),不同学科有不同的认识。在建筑学视野中,城市是不同建筑的集合体,一个好的城市首先是空间结构合理、布局与功能完善的城市;在经济学视野中,城市更多地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一个好的城市也就是产业结构合理、有产业比较优势与经济竞争力的城市;在政治学视野中,城市更多地是一个独特的权力与治理结构,一个好的城市也就是一个有良好权力关系与治理秩序的城市;在社会学视野中,城市是一种不同于乡村社会的新型社会

^① 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 页。

2 城镇化与城乡融合

关系,一个好的城市也就是一个社会矛盾较少、社会关系和谐的城市;在文化视野中,“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Polarization)”^①。在文明史与历史学视野中,城市是诸多人类文明要素的聚集,一个好的城市是一个可以保存与发展人类文明的场域。

在分门别类研究城市的同时,面对日益巨大的城市、日益复杂的城市问题,诸多学者开始注重用一种多维、综合的眼光看待城市,努力呈现城市本性的复杂性、杂糅性。在《全球城市史》的作者科特金看来,城市是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体,意义、繁荣、安全是一个可持续城市的三个必备要素,“有三个关键因素决定了这些城市的全面健康发展,即:地点的神圣;提供安全和规划的能力;商业的激励作用。在这些因素共存的地方,城市文化就兴盛;反之,在这些因素式微的地方,城市就会淡出,最后被历史所抛弃。”^②在列斐伏尔、索亚等看来,城市社会是深刻区别于乡村社会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社会发展阶段或社会建构方式。城市发展不仅是人口、资源、技术、产业等文明要素的空间化聚集,更是发展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文明传承方式等的整体性转换。列斐伏尔认为,城市化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空间改造与经济增长过程,城市化是人们在历史与社会条件下进行空间生产的过程,作为经济过程、资本运作过程的空间生产、城市发展,实质上具有深刻的政治性、文化性。在《韵律分析》(Rhythmanalysis)一书中,列斐伏尔倡导从社会、历史、空间相统一的角度认识空间生产与城市发展、社会变迁。在他看来,城市发展、空间生产“任何情况下,都是场域(place)、时间(time)与精神(energy)的互相作用的过程,这就是韵律”^③。在索亚看来,城市是人与空间相互作用的产物,“一方面,我们的行动和思想塑造着我们周围的空间,但与此同时,我们生活其中的作为聚集性和社会性产品的空间与场域也以一种我们刚刚开始认识的方式塑造着我们的行动和思想”^④。需要从空间性、社会性、历史性三个维度的统一中,从第一空间(作为实物的空间、空间中的物体)、第二空间(作为表达的空间、关于空间的思想)、

①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宋俊岭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② 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③ Henri Lefebvre, *Rhythmanalysis*, London, Continuum, 2004, An Introduction.

④ Edward W. Soja, *Postmetropoli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Ltd, 2000, p6.

第三空间(作为行动和意义的实现和表达的对象与载体的空间)的统一,从空间的感知性(perceived)、构想性(conceived)和鲜活性(lived)的统一,去理解和认识城市。^①

在黑格尔看来,密纳发的猫头鹰到傍晚才起飞,认识论上,人们对仍处于过程中的事物往往很难把握其本质。城市研究也是如此。芒福德认为,“人类用了5 000多年的时间,才对城市的本质和演变过程获得了一个局部的认识,也许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弄清它那些尚未被认识的潜在特性”^②。面对仍处于过程中并日益复杂的城市化,一方面,需要从不同专业视阈出发,对城市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推进城市经济学、城市政治学、城市社会学、城市文化学、城市科学等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更要求人们自觉确认一种综合的城市研究视阈,建构一种没有学科边界与专业归属的广义城市学、城市哲学,以对城市本性、城市问题、城市理想进行更为全面、综合、系统的把握。

二、内在“城市善”与城市发展的伦理视阈

生活城镇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是当代中国的三个重大发展任务、发展问题。能否正确理解、科学推进、统筹协调生活城镇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将深刻决定中国未来面貌。在快速发展中,城市化对中国的综合影响日益增大。一方面,城市化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城市化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另一方面,由城市化方向设置与推进方式不合理所引发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有增多的趋势。进一步明确城市发展方向、转换城市发展方式、推进城市综合转型,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相对我国城市发展中实际存在的GDP情结、经济中心主义倾向,需要为城市发展注入自觉的发展伦理精神,实现城市发展的伦理视阈。

在古莱、可思波等看来,“发展伦理学的重要任务是使得发展行动保持人道,以保证在发展旗号下发动的痛苦变革不产生反发展,反发展摧毁文化,付出过度的个人痛苦并牺牲社会福利,这一切都是为了利润,为了绝对化的意识形态,或是为了某种所谓的效率需要”^③。面对经济中心主义发展实践所引发的

① Edward W. Soja, *Postmetropoli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Ltd, 2000, p12.

②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宋俊岭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③ 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诸多问题,需要确立一种符合伦理精神、以人为目的的新发展观、发展伦理观。发展伦理学对发展进行两个层面的反思,其一,什么是发展的目的,什么是好的发展?其二,什么是合理的发展手段,如何实现好的发展?关于发展的目的,古莱等认为,在发展与人的关系中,发展是手段,人是目的,发展的根本目的不是经济效率,而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由三个要素构成。“有三种价值观是所有个人和社会都在追求的目标:最大限度的生存、尊重与自由。这些目标是普遍性的,虽然特定方式因时因地而异。”^①关于发展的方式,古莱等认为,不论是采取何种技术、经济、政治手段,“发展的好处应当惠及所有的社会,惠及社会上的每一个人”^②。在推动发展时,“所有的社会都可以找到物质刺激与精神刺激的某种混合,因为两者都是必需的”^③。普遍参与普遍团结对推进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受益者的参与或者发挥某种积极作用是一切形式的发展所不可少的特征”^④。符合伦理精神、具有伦理底蕴的发展,也就是一种发展的手段与目的两个方面都体现“以人为本”精神的发展,一种具有自觉的“内在善”的发展。

对我国城市发展而言,明确城市的发展伦理底蕴,自觉建构“城市善”,对规范中国城市发展、解决中国城市问题、推进城市综合转型,尤为迫切与重要。“城市善”是“什么是好的城市”与“如何建设一个好的城市”的深层伦理统一,是对城市发展目的、城市发展手段的“人本性”的自觉确认。推进“城市善”的过程,也就是用“以人为本”统筹城市发展目标与城市发展手段的过程。其一,推进城市善,需要进一步明确城市发展的目的。城市是一个财富有机体,更是一个生活有机体。“人们聚集到城市里来是为了居住。他们之所以聚居在城市里,是为了美好的生活。”^⑤在人与城市的关系中,人是目的,城市是载体与手段。是否有利于人的成长与全面发展,是评价城市发展目标是否合理的根本标准。其二,推进“城市善”,需要进一步规范城市发展手段。面对不合理的城市化手段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规范城市发展手段势在必行。能否处理好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城市空间扩张、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改善、生活幸福的关系,是评价城市发展手段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其三,城市发展决

① 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② 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③ 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

④ 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

⑤ 芒福德:《城市文化》,宋峻岭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517页。

策过程的科学化、民主化,社会多元主体的普遍团结及其对城市发展的普遍参与,是实现城市发展目标与城市发展手段相统一,构建“城市善”的重要途径。在我国政府主导型城市发展的现实语境下,逐渐淡化各级政府发展与政绩考核中的GDP色彩,对建构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生活幸福和谐统一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繁荣的城市,对建构“城市善”,具有基础意义。

三、本土“城市根”与城市发展的中国视阈

城市化、城市社会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一方面,城市化、城市社会是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趋势,“只有在城市这个古老的神圣、安全和繁忙的合流之地,才能够塑造人类的未来”^①。另一方面,人们对城市意义、安全、繁荣的理解和建构,不同国家地区的城市化道路又具有深刻的本土特殊性、文化多样性。面对突出的城市趋同化、无差异化、无个性化,尤其需要确认城市发展的本土“城市根”,为建构既符合城市发展一般规律又切合本国实际、直面本国问题、各具特色的中国城市形态与中国城市社会,提供基础视阈、文化自信。

明确中国城市发展的基础视阈,确认中国发展的本土“城市根”,需要处理好三组关系。(1)城市目的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一般而言,城市以人为目的,城市是一个综合文化体,确认城市发展的人本性、文化性,对规范中国城市发展行为、明确中国城市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但人与文化又都是具体的,不同地区与国家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等具有差异性,不同地区与国家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走向也存在差异性。城市形态是人的主体需要与文化精神的对象化、现实化,没有人性与文化的具体性,也就没有城市形态与城市社会的个性化。充分考虑和尊重城市发展文化基础与文化走向的具体性,是建构既符合城市化一般规律又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城市体系、城市社会的重要观念前提。(2)城市发展构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正确处理政府、社会、市场等的关系,是实现城市良性发展的一般构架。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直有其特殊性。“中国城市是在以农为本的文明框架内兴起的。”^②中国特殊的历史传统及当代复杂竞争环境,共同造就了政府在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这就要求我们在自觉培育城市社会发展的多元主体力量的同时,客观历史地评价“政府主导型城

① 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页。

② 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

市化”对当代中国、当下中国城市化的历史意义。(3)城市形态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经济全球化语境下,不同地区的城市功能有趋同的趋势。这与人的基本需要的同构性及产品、技术、业态等的全球同质性内在相关。但城市功能的这种趋同化,并不意味着城市个性的必然消失。在芬伯格看来,即使是现代性技术,也具有深刻的多样性、可再造性、可选择性。^①如何结合不同地区的地理气候、文化传统,挖掘、创新有一定差异性的本土化城市元素,构建有本土特色的城市形态,对提高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建构中国城市社会的文化独特性,实现中国城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基础意义。

确认城市发展的本土“城市根”,是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具体统一。一方面,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形态、城市社会,需要挖掘、传承中国传统的城市文化元素,没有对中国传统生存方式、居住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等的传承,也就没有城市社会语境下的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塑造中国城市个性,更需要不断进行自觉的城市文化创新。从起源始,城市就是人类创新的产物,“城市也代表着人类不再依赖自然界的恩赐,而是另起炉灶,试图构建一个新的、可操控的秩序”^②。“城市表达和释放着人类的创造性欲望。”^③推进城市发展的民主化进程,充分发挥不同文化主体在城市形态构建与城市文化建设中的首创性、创造性,将深刻推进中国城市形态与城市社会的特色化、本土化。文化保存意识与文化创新意识的双向自觉,将使中国城市发展、城市形态、城市文化既符合城市发展一般规律,又具有鲜明个性。

四、苏南“城市型”与城市研究的人类学视阈

人们往往习惯性地认为,城市的兴起晚于农业革命,城市化是一个近代的发展现象,社会演进的常规次序是“狩猎与采集——农业——村庄——城市——国家”。索亚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挑战,认为还存在另一种次序,一条“首先是城市”(putting cities first)的次序。通过反思坐落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谷的杰里柯(Jericho)等城市的发展,索亚指出,“新石器和农业革命以及随后的书写的发展、纪念性的建筑、国家和其他文明的先决条件都可以视为从城市的起源

① 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② 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1页。

③ 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中发展而来的,而非相反。这个观点推翻了很多史前史的传统解释”^①。在索亚看来,城市的起源早于农业革命,城市化不仅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而且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起源性动力。需要把“城市的起源在时间置于农业革命之前”,“有必要把村镇的联合……看做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序列中的基本和持续的动力”。^② 科斯托夫在《城市的形成》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城市与乡村哪一个更早出现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③,“早期的城市以多样化的面孔出现。在进入主体讨论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放弃这样一个观点——即城市是从村庄形式开始有机地生长起来”^④。索亚、科斯托夫的观点当然可以商榷,但他们对社会发展次序、城市生成与作用的这种颠覆性反思,却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城乡关系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需要对城乡关系进行更加细致与辩证的考察与理解,离开了对城市与乡村关系的深刻理解,对城市本质、城市化的理解可能出现偏差。

需要在城市发展与城市研究中引入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视阈。在哈维兰等文化人类学家看来,当代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文化相对论,承认、尊重多样文明存在的合理性;一个基本功能是反思、批判片面的自我中心论,倡导从多样统一的角度考察文明与文化的关系。^⑤ 对当代中国城市研究而言,引入以多样并存为基本观点的文化人类学视阈对于重新理解、合理定位中国城市化的未来方向,重新理解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探索中国城市社会的新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城市与乡村的多重分裂。这种分裂不仅表现在城市与乡村在空间上的分裂,在生活方式、生活水平、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更表现在土地管理、社会管理等公共管理、公共政策上的巨大差异。正如诸多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当代的城市化,在诸多方面仍然深层延续着传统的城乡二元模式,中国当代的城市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农业、农村、农民的直接或间接的“盘剥”基础上。形成这种城市与乡村深层多重分裂、城市压制乡村的社会建制、社会运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观。自觉引入人类学视阈、文化人类学

① 索亚:《后大都市》,李钧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② 索亚:《后大都市》,李钧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③ 斯皮罗·科斯托夫:《城市的形成》,单皓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④ 斯皮罗·科斯托夫:《城市的形成》,单皓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⑤ 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瞿铁鹏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态度,有利于克服这种以城市为中心、不尊重甚至歧视乡村的城市社会观、社会发展观。

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从具体条件出发,探索推动城市与乡村共同发展、平等发展、平衡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一般而言,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基本上存在两种模式,一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由上而下的城市化,一是以乡村为主导的由下而上的城市化。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往往会出现第一种模式,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往往会出现第二种模式。众所周知,以苏州、无锡、常州等为中心的苏南地区是我国的经济发达地区,既是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取得诸多成就的地区,也是率先遭遇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包括城市化的诸多深层次问题与矛盾的地区。作为资本主义较早萌芽的地区,作为人口、土地、资源矛盾相对紧张的地区,作为乡村经济较早发育、较为发达的地区,苏南表现出强烈的自发城市化、由下而上城镇化的强大动力与深层需要。当这种内在需要与政府的强力推动相结合时,便产生了以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本土经济与外来经济、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共同发展为重要支撑的颇具特色的当代中国城市化、城镇化苏南模式。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苏南发展,所谓的苏南模式,不仅是一种有特色、重集体的经济增长模式,更是中国城市化模式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类型。中国城市化的苏南模式、“苏南类型”有其巨大的成就,也有其需要进一步改革、转型升级的深层问题。反思苏南的城镇化、城市化的经验教训、成败得失,对形成、运用中国城市研究的伦理视阈、文化人类学视阈,建构既反映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又符合中国城市发展特殊国情的中国城市理论,探索由不同具体模式构成的中国城市化、中国特色城镇化的“模式体系”,理解与解决城市与乡村关系的中国特殊性,具体、和谐、合理地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引论 中国农村城镇化的理论与实践背景	(1)
第1章 实践反思:中国农村城镇化的经验教训	(8)
1.1 产业失调和空间失调	(9)
1.2 户籍划分和反城市化	(18)
1.3 政府推动与市场失灵	(23)
1.4 资源分割和收入失调	(25)
1.5 要素城市化和人口农村化	(29)
1.6 粗放式经营和环境污染	(35)
第2章 理论创新:城市化与城乡协调发展	(37)
2.1 二元经济结构与二元社会结构理论	(37)
2.2 国外城市化模式比较研究	(44)
2.3 我国的城市化道路选择	(52)
2.4 传统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	(57)
第3章 空间融合:由蔓延式城镇化向紧凑型城镇化转变	(61)
3.1 城乡协调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61)

2 城镇化与城乡融合

3.2 城乡空间不协调是我国城镇化面临的严重问题·····	(63)
3.3 紧凑型城镇化是城乡空间融合的基础和动力·····	(68)
第4章 产业融合:统筹城乡产业布局 ·····	(74)
4.1 农业对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74)
4.2 “三农问题”与第一产业发展·····	(81)
4.3 结构转变与第二产业发展·····	(86)
4.4 产业融合与第三产业发展·····	(90)
第5章 人口融合: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 ·····	(95)
5.1 城市化进程中我国的人口流动·····	(95)
5.2 我国人口流动的特点·····	(98)
5.3 城乡人口流动驱动因素分析·····	(101)
5.4 人口流动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03)
5.5 作为人口流入地的大城市应采取的措施·····	(107)
5.6 农村的保障性措施·····	(110)
第6章 就业融合: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	(113)
6.1 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	(113)
6.2 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及其原因·····	(121)
6.3 建立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的经验·····	(125)
6.4 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具体措施·····	(128)
第7章 收入融合:实现城乡居民的共同富裕 ·····	(134)
7.1 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	(134)
7.2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的阶段性划分及特点·····	(136)
7.3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表层因素·····	(142)
7.4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因素·····	(145)

7.5 提高农民收入的对策	(151)
第8章 消费融合:城乡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对接	(159)
8.1 消费与经济增长	(159)
8.2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	(166)
8.3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扩大所带来的问题及原因	(173)
8.4 促进农村消费,实现城乡消费的对接	(176)
第9章 环境融合:从城乡环境对立走向城乡环境融合	(181)
9.1 城乡环境对立是我国环境问题的重要根源	(181)
9.2 城乡环境融合的思路	(185)
第10章 社会和谐:城乡文明的一体化	(193)
10.1 社会的构成元素	(193)
10.2 建立和谐社会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195)
10.3 我国城乡对立引发的主要社会矛盾及原因	(201)
10.4 社会和谐:社会制度的统一	(206)
10.5 社会和谐:农民和市民的统一	(210)
结束语 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融合	(214)
参考文献	(217)
后 记	(224)

引论 中国农村城镇化的理论与实践背景

城镇化是近现代引人注目的社会经济现象,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近现代发展史表明,城镇化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工业化的出现而产生的,推进城镇化是完成落后农业国向发达工业国跨越的必由之路,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积极稳妥地加快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选择,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城乡融合的根本出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城镇化进程是对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一种突破与创新过程,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中的较为突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农民增收问题、城镇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补偿问题、产业结构升级问题以及启动农村市场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等问题。而从长远来看,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对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市化和工业化协调发展,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城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城镇化,或称城市化、都市化,是英文单词 Urbanization 的不同译法。除农村居民点外,镇及镇以上的各级居民点都属城镇地区,它既包括城,也包括镇,因此将 Urbanization 译作“城镇化”可能更为全面。尤其是在中国,由于大量的农民进入小城镇实现就地转移,用“城镇化”一词能更准确地反映中国农村人口转移的特点。所以在本书中,我们将更多地使用“城镇化”这一概念。城镇化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大批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城镇人口比重不断提高;二是原来从事传统低效的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转向从事现代高效的第二、三产业,产业结构逐步升级转换,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不断提高;三是大批低消

费居民群体转变为高消费的居民群体,带来市场不断扩张、对投资者吸引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国民在发展中享受到实惠;四是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并向广大农村渗透和传播,实现城乡文明的一体化;五是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告别自给自足,摆脱小富即安,追求文明进步,崇尚开拓进取,人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因此,城镇化是由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变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城市社会将呈现出区别于农村社会的新秩序,社会化、商品化、规范化、法制化将是城市秩序的基本特征。可见,城镇化绝不仅仅表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城镇数量增加,更表现为城镇体系逐渐完善、城镇功能不断健全、城镇环境持续改善和城镇管理水平日益提高的过程,是乡村人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统一,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综合体现。在中国,这一概念还与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农村工业化高度相关,与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体制密切相关。当农民尚不能进入城市去发展工业时,在农村集镇乃至村镇发展自己的“农民城”就顺理成章。另外,从政策层面,“城镇化”这一概念包含了积极发展县域重点镇的政策取向,是针对片面发展大城市问题而提出的。当然,提“城镇化”并不是不发展大城市,而是强调建立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城镇化的本质是工业化。城镇化是在工业化的推动下才发生的,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镇化,这是一个普遍真理。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发动机”,离开了工业化,城镇化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工业化的发展形成人口的流动,也需要集中于一定的地域,工业生产必然要向城镇聚集,从而带来居住地的集中,推动城镇化步伐。城镇化对工业化也具有促进作用,城镇化能够顺应工业大规模集中的需要,能推进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可见,城镇化与工业化要协调发展。按照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使从农业中析出的劳动力流向城市,城市的工业化可以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结果是人口的聚集和城市的扩张。按照钱纳里的发展模型,在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都达到 13% 左右时,城市化率开始加快,并明显超过工业化率。同时,发展中的城市以其聚集效应对工业持续增长具有拉动作用。但在城市化后期,工业化对城市化的作用开始减弱,工业化率下降,城市化水平提高。

城镇化的方向是促进城乡融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达国家的城乡一体化过程提供了许多实践经验。在城镇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城乡关系演进的路径是:乡村

孕育城市——城乡分离——城市统治和剥夺乡村、城乡对立——城市辐射乡村——城市反哺乡村——城乡融合^①。工业革命早期,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英国和西欧国家出现了工农分裂、城乡差别加剧、城乡对立严重等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城乡经济一体化的主张。从19世纪中叶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整个社会、经济、技术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工业化的发展,促使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集中,城镇化水平加快。至20世纪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城乡之间的差别明显缩小。近年来,由于城市工业的扩散和快速交通网络的建设,促使大量城市人口由城市向郊区和小城镇迁移,给城市郊区和小城镇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成为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一个新趋势。目前,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进入后现代化社会和城市化高级阶段,城乡差别已相对较小,而清新的空气、优美的景观、舒适的生活、各种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果已使农村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人口逆向流动的现象已露端倪。

世界各国城镇化的历程,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思维结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发展进程。发展理念决定发展模式和道路,发展模式和道路又影响发展进程。世界各国的城镇化发展大体上有以下四种模式:第一种是同步城镇化,即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趋于一致的城镇化模式,表现为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互相协调,城镇人口的增长与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比较一致,农村人口城镇化的数量与经济发展提供的城镇就业量大体平衡,城镇化的发展与农业提供的剩余产品基本适应。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经济发展推动型的城镇化道路,它能够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及社会经济的适度同步发展,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基本属于这种模式。第二种过度城镇化,指城镇化水平大大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镇化模式。第三种是滞后城镇化,和前一种相反,这是一种城镇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镇化模式。产生滞后的原因是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限制城镇化的发展,结果使城镇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都不能很好地发挥,严重阻碍了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不合理的城镇化模式。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就采取了这种城镇化模式。第四种是逆城镇化,又称反城镇化,指城镇人口郊区化、城镇布局分散化的城镇化模式,表现

① 石忆邵:《城乡一体化理论与实践:回眸与评析》,《城市规划汇刊》2003年第1期。